

《边城》与《古都》对于乌托邦的现代性回应

谢凯聿

天津财经大学 天津 300222

【摘要】：本文以沈从文的《边城》与川端康成的《古都》为研究对象，探讨两者在“乡土乌托邦”建构与现代性回应方面的异同。通过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与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揭示现代性如何以无形方式侵蚀乡土空间，并比较了沈从文的“伦理坚守”与川端康成的“美学凝望”两种不同的回应策略。

【关键词】：《边城》；《古都》；空间理论

DOI:10.12417/3041-0630.26.03.087

在东亚现代性进程中，文学创作常以“乡土乌托邦”的想象回应现实冲击。沈从文的《边城》与川端康成的《古都》均为典范，二者均借助理想化空间表达现代性的深刻反思。本文通过引入“建构—侵蚀—回应”的分析框架，旨在系统比较两部作品如何以相异的伦理与美学策略，呈现并应对现代性对乡土世界的无形侵蚀，从而丰富对东亚现代性多元经验的理解。

1 研究背景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作家沈从文的《边城》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古都》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为重新审视和构建世界文学的版图提供一种非西方的、区域性的批判性视角。

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两个在20世纪经历了截然不同现代化路径的国家，其作家在面对现代性冲击时所产生的文学回应，必然具有各自的独特性。通过对比分析中日乡土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试图打破“现代性”的单一神话，为世界文学研究提供一种东亚内部的、多元的现代性经验案例。

1.1 研究问题

本文选取沈从文的《边城》（1934）与川端康成的《古都》（1962）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这两部作品在各自的文学史中都具有经典地位，并被视为其乡土情怀的集中体现。两部作品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构建了一个理想化的乡土空间，以对抗现代性所带来的冲击。

基于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两位作家如何通过文学建构乡土空间来回应对现代性冲击，其回应的异同揭示了东亚现代性怎样的复杂面相。本研究将通过对本体的细致分析，探究两位作家在文学实践中如何描绘理想的乌托邦，这些乌托邦又如何被现代性力量侵蚀，最终，作家们又采取了何种回应策略。

1.2 研究方法

为深入探究上述问题，本文将运用空间理论作为核心分析工具。引用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和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

引言之后，第二部分将系统阐述上述理论透镜。第三部分将以《边城》为例，分析其牧歌图景下的裂隙与伦理重建的尝试。第四部分则转向《古都》，探讨其风物哀叹中的消逝与美学精神的退守。最后，第五部分将进行总结性比较，论证本研究的意义。

2 列斐伏尔与福柯的理论应用

传统的文学分析往往将空间视为故事发生的静态背景，而忽视了其作为社会关系的动态产物。在文学作品中，作家笔下的“乡土乌托邦”正是对现实社会异化的抵抗，属于一种理想化建构。茶峒和京都不仅仅是两个地理地点，它们是作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通过“再现”和“想象”生产出的、承载了强烈文化批判与社会意义的“社会空间”。因此，分析这两部作品中的乡土空间，需要追问它如何被建构，它又承载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

在分析现代性对这些文学空间的侵蚀时，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概念至关重要。福柯指出，权力并非仅仅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强制力量，它更是弥散性的、无处不在的“微观物理学”。这种权力通过“权力/知识”的机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通过“规训”来塑造个体。在文学文本中，现代性的侵蚀往往不是通过显性的暴力，而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力量，例如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新的社会道德标准或消费主义的诱惑。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将采用“乌托邦建构——权力侵蚀——作者回应”的三步分析框架。

3 《边城》：牧歌图景下的裂隙与伦理重建的尝试

3.1 《边城》茶峒作为文化母胎

沈从文通过《边城》对茶峒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将其塑造成一个充满自然和谐与伦理之美的“牧歌式乌托邦”。作品中，渡船、白塔、溪流以及赛龙舟、走车路等淳朴民俗，并非简单的地理或风俗描写，而是承载了作者理想的象征性空间。这种对理想乡的建构，是沈从文作为“乡下人”对现代都市文明的批判性回应。

沈从文的乌托邦并非一个封闭、完美的世外桃源，而是从一开始就充满吊诡与内在的矛盾性。这种内在的裂隙使其具有更丰富的叙事复杂性，也暗示了其固有的脆弱性。这种吊诡体现在，茶峒虽然是田园牧歌的颂歌，但其内部却已内含着孤独、隔阂与悲剧的种子。老船夫的孤独与离世、傩送的出走、翠翠的守望，都并非源于显性的外部力量，而是内部人情伦理在现代性逻辑面前的无力感所致。

3.2 无形权力的侵蚀与裂隙

茶峒的崩解并非源于外部的武装侵略或暴力冲突，而是来自现代性的微观权力渗透，这种渗透是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

具象化的侵蚀体现在碾坊的象征意义上。碾坊代表了城市的资本逻辑和功利主义，它与渡船所象征的传统、非商品化的伦理生活形成鲜明对立。作者通过这一意象，巧妙地将宏大的资本主义概念微缩进一个具体的文学空间中。此外，悲剧的发生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误会。顺顺对老船夫的误解，天保与傩送之间的心结，以及翠翠与他们的隔膜，并非源于直接的恶意，而是传统人情社会在现代性冲击下所产生的沟通障碍和交际本领的缺乏。这种孤立感，正是传统社会瓦解的征兆，它以无声的方式瓦解着茶峒的伦理结构。

3.3 回应的策略：悲剧后的伦理坚守

面对乌托邦的崩解，沈从文的回应是一种具有强烈历史介入性的伦理坚守。这种回应并非空洞的悲叹，而是对爱与美的信仰，是对正直和热情等美德的执着坚守。

《边城》不仅是对逝去美好事物的挽歌，更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社会文化批判作品。他不是直接描绘外部力量的碾压，而是细腻展现内部微妙裂痕。这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策略，其目的并非开历史倒车，而是试图为民族的现代转型寻找一种内在的、稳定的精神锚点。唯有从人性深处的爱与美出发，重建伦理价值，才能应对现代性带来的价值虚无与道德失范。这使得《边城》的悲剧，不止于哀伤，更蕴含了一种在绝望中孕育希望的、具有建设性的力量。他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直接描绘战争和革命，而是退守到乡土，挖掘人性中的真善美，将其视为民族复兴的内在资源。

4 《古都》：风物哀叹的消逝与美学精神的退守

4.1 《古都》京都作为文化容器

川端康成在《古都》中，通过对京都风物、节日和传统工艺的细腻描绘，将古都建构为一个充满物哀之美与千年传统的审美乌托邦。他笔下的京都，是“春花”、“祇园祭”、“冬天的花”等四季景观交织而成的诗意世界。这种描写不仅仅是风景画，它融入了日本独特的物哀美学，是对一种即将消逝之美的极致凝视。京都成为了一个承载历史与美学精神的“文化容器”，一个美丽与哀愁的精神家园。

川端康成对京都的审美化建构，与沈从文的伦理化建构形成了鲜明对比。沈从文的乌托邦是面向人和社会关系的，其核心是道德感和人情伦理。而川端的乌托邦则是面向美和精神的，其核心是对自然、传统与人生之美的捕捉与哀叹。前者是社会伦理的瓦解，后者则是传统美学精神的消逝。川端笔下的京都，并非一个自足的完美世界，而是一个脆弱的孤岛。

4.2 现代性时间的挤压与吞噬

对京都的侵蚀并非显性的外部暴力，而是一种现代性“时间”的挤压，它通过消费主义、旅游业与文化异化等无形力量静静地吞噬着古都。以西阵织为例，这种国宝级的传统工艺并非被暴力摧毁，而是因和服需求收缩而衰退。与此同时，它又以商品化的形式被现代百货店和奢侈品牌重新定义，例如GUCCI与西阵织老铺的合作。这种现代与传统的巧妙碰撞，恰恰是传统精神被剥离、变为可消费符号的隐喻。

此外，旅游业的侵蚀也是一种重要的现代性力量。在《古都》发表时（1962年），京都已是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然而，文本通过描绘游客对京都日常生活的扰乱，以及京都人与游客之间界限分明的疏离感，揭示了这种无形的侵蚀。游客的购买瞬时体验和对日常空间的物理半径的破坏性，使得这座城市逐渐变成了“游客的京都”，而非“京都人的京都”。

书中太吉郎的应对方式是逃避和内向化。他时常躲到嵯峨的尼姑庵里寻求清静，这并非单纯的休闲，而是一种精神上的退守。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熟悉的、日渐缩小的美学空间里，进行最后的坚守。太吉郎的形象，与京都这座城市形成了深刻的互文：他们都曾是辉煌的“容器”，而今却在新的时代里显得格格不入，只能以一种近乎固执的“凝望”，来维系自身与过往传统的脆弱连接。他的存在，让京都的“物哀”不再仅仅是风景的哀叹，更是具体个体生命的、切实的精神困境。

4.3 回应的策略：哀婉中的美的凝望

面对乌托邦的崩解，川端康成的回应是一种虚无超脱性的“美学凝望”。他没有试图提供任何外部的拯救或解决方案，而是将抵抗内化为对消逝之美的无尽挽歌式书写。小说结尾，

苗子在细雪中悄然离去的场景，既是个人命运的抉择，也是一种永恒的别离的象征。川端将人物的悲剧命运与古都的衰颓融为一体，将对美的凝望作为唯一的抵抗策略。

川端康成的美学凝望，其力量正根植于日本传统的物哀精神。物哀并非单纯的悲伤，而是对事物短暂易逝之本质的深刻洞察与情感共鸣，是一种在无常中确认美之价值的哲学。

这种美学姿态体现了日本独特的“虚无美学”和“物哀”精神。其根源在于战后独特的历史语境。当《古都》创作于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时，社会面临的危机已非民族存亡，而是物质丰裕带来的精神空虚和传统文化的消逝。因此，川端康成没有理由去呼吁伦理重建，他能做的，只是用一种哀而不伤的笔法，记录下那些即将被现代时间吞噬的美好事物，以此作为一种“对传统的挽歌”，将文学的抵抗退守到纯粹的美学领域。这种姿态体现了日本作家在历史转折中的“超脱性”。

5 《边城》与《古都》的比较

通过对《边城》与《古都》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介入性、伦理）与川端康成（超脱性、审美）在乌托邦建构与现代性回应上的根本差异。这种差异并非偶然的文学选择，而是深刻根植于各自民族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心理。

在创作《边城》的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的伦理坚守是对民族精神的救赎，旨在为一个处于存亡边缘的社会提供道德根基。而在创作《古都》的1962年，川端康成的美学退守则是对一个物质丰裕但精神迷失的社会的挽歌，旨在通过对美的凝视来抵抗虚无。

下表呈现了两位作家在乌托邦建构与现代性回应上的核心差异

比较维度	《边城》	《古都》
------	------	------

乡土乌托邦的建构	伦理乌托邦：以人情与自然，建构具有道德感的理想乡	美学乌托邦：以风物与传统为核心，建构具有物哀感的理想乡
现代性的侵蚀	无形权力侵蚀：城市资本、政治意识、人情冷漠	时间挤压与吞噬：消费主义（西阵织商品化）、旅游业异化、世系衰微
作者回应策略	历史介入性的伦理坚守：以“白塔重建”寄托民族品德重造理想，旨在寻找民族出路	虚无超脱性的美学凝望：以“细雪中的告别”为终，将抵抗内化为对消逝之美的挽歌
创作背景	民族存亡的战时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道路的时代	经济高速发展，民族文化面对西方文化浪潮冲击，传统面临消失的时代

回看两者的比较，我们能看到其回应策略深植于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当今全球化与城市化浪潮中，中国的美丽乡村建设或可从《边城》中汲取重建社区伦理的养分；而世界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则可从《古都》中获得如何以敬畏与凝望之心对待传统的启示。二者的殊途同归，正表明了面对现代性这一宏大议题时，文学所能提供的回应是无比丰富而深刻的。

6 结尾

未来的研究可将更多东亚文本纳入这一框架，如老舍的《骆驼祥子》、谷崎润一郎的《细雪》等，以深化对东亚现代性经验的理解。同时，本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今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下，乡村振兴与文化遗产再次成为焦点。沈从文的伦理坚守与川端康成的美学凝望，分别为我们提供了两种思考和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 [1] 沈从文.沈从文别集·边城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5.
- [2]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M].东京新潮社,1997.
- [3] 亨利·列斐伏尔著刘怀玉等译《空间的生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4] 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M].北京三联书店,2003.
- [5] 王波《沈从文<边城>与<长河>“村寨”空间研究》[D].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
- [6] 张建伟《<边城>与<雪国>比较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
- [7] 邓小燕.西南集镇与沈从文的乡土空间[J].社会科学文摘,2024,(10):57-59.
- [8] 张颖.文学经典重塑乡土景观——以川端康成《雪国》为例[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1(04):16-23.
- [9] 周建漳.福柯后现代微观权力言说述评[J].江西社会科学,2010,(01):53-58.